

王振忠，《明清以來徽州村落社會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303頁。

社會史興起的一大動力，是史家對政治的追問深入至基層社會，觀察宏大歷史的演化究竟如何變異，並內在於地域社會的具體變遷之中。隨着歷史研究者關注視線的下移，史料的開掘方向亦向基層社會推進。復旦大學王振忠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在徽州鄉村進行了數十次村落人文地理考察，收集了總數多達一萬數千件（冊）的徽州文書。早在徽州研究尚處於幾為契約研究代名詞之時，王振忠便已開始獨闢蹊徑，從瑣碎的文書史料中耙梳整理出傳統中國基層社會的生活面貌，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明清以來徽州村落社會史研究——以新發現的民間珍稀文獻為中心》便是他在徽州文書研究方面的第三部專著。

在這部新作中，作者在民間文書概念基礎上，細化提出了「村落文書」的概念：「所謂村落文書，是指圍繞着某一村落為中心，將本村及周遭之相關檔案匯輯成冊的抄本、稿本。」（前言頁2）具體言之，可分為業經系統整理的完整村落文書、村落日用類書、社文書和零散雜抄四大類。着眼於微觀尺度的基層研究，地區差異不可不察，而民間生活的多樣性與地方性也正體現於空間分異之間。因此，包含明確地理信息，具有一定篇幅規模的村落文書便顯得彌足珍貴。

那麼，以特定空間為彙編導向的村落文書是如何形成的呢？作者利用私人收集（王藏本）和安徽省圖書館度藏（安圖本）的兩種《新安上溪源程氏鄉局記》抄本，通過互校對勘，展示了一冊村落文書形成的動態過程。該文書為婺源縣上溪源村公共事務各類規條和記錄的彙編，較之安圖本，王藏本的目錄與資料編排更為整齊，文字亦有增刪潤飾。同時，根據文書內容下限，亦可知王藏本為安圖本的增補續輯，但從頁碼編排等細節來看，王藏本依舊為未定稿。可見，村落文書隨世易時移，一直處於積累更新狀態。參照同在徽州發現的多種村落文書形態，作者指出，完整村落文書的形成，大致經過一事一記的散件或簡單簿冊，即時抄錄匯總的簿冊，系統整理、添加目錄的簿冊三個階段。累積匯輯而成的村落文書，在村民看來，是村落管理的實用手冊和事實依據，同時，因其內容的時代縱深，也成為村志乃至縣志編纂的重要素材。

日常生活具有不斷重複的特性，記載民間生活的翔實史料，多因一事一

記而缺乏足夠的時間張力，作者運用分門別類記載生活常識及文書活套的民間日用類書，巧妙地化解了日常生活史研究中的一個難解之結。成書於婺源民間日用類書《目錄十六條》，記錄了康雍乾時代當地村落生活的多個方面。這些記載多以文書活套和程序解說的形式出現，並且得到了眾多當地其他文書的印證。傳統中國基層社會秩序維持所依據的「法」，常表現為具體的案例和習慣。活套、程序及旁證，證實了民間日用類書所載內容在民間生活中出現的頻度，這正是基層民眾實實在在據之以用的生活規範。用文字固化的地方知識，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均具有強大的張力，村落日用類書的編輯、傳抄和使用，形成了地方民俗在空間上的橫向衍播和在時間上的縱向傳承，直接促成了徽州社會的「一體化」。清代中期以後，全國性的《萬寶全書》中，關禁契約等門類被大量刪削，以往研究推測其原因是這些內容不符合一般民眾的日常需求，而對《目錄十六條》等文書的研究表明，清中期以降，這部份內容在村落日用類書中依然大量存在。據此，作者提出，全國性《萬寶全書》中逐漸缺失的內容，其實轉移到了專業性類書和地方性類書中，三種類書在基層民眾的知識供給上呈互補之勢。

村落文書由以村中斯文為代表的基層知識份子所纂輯，文化程度有限的普通民眾，又是如何操作文書中所述各種複雜的禮儀程序呢？根據族譜、日記、官箴和文書史料的記載，祠祭、墓祭、會祭、喪儀、冠禮、婚禮和祈雨等地方儀式中均有禮生擔任司禮角色。村落中對禮生充任資格的認定，最基本的標準是其人對禮儀的熟悉程度，在文風蔚盛的村落中，有功名者具有擔任禮生的優先權，而禮生一職也標誌着其人在村中的地位。與在福建、江西等地研究所見類似，村落中的禮生大多並不是一種固定的職業，而是臨時擔當的一種角色。禮生所使用的祭文本，除各類儀式程序和祭文外，還包含契約活套等世俗內容，以往研究據此推斷禮生在村落中的多重身份，針對這一現象，作者從村落文書的角度對此加以解讀，認為正因為禮生只是村內通曉文墨者時常所兼村落事務相關角色之一種，所以他們所持祭文本的內容自然包括多種村落事務，在此意義上，祭文本亦可視為一種村落日用類書。

傳統中國社會的組織形態，實在地體現於具體的鄉村活動中，書中透過在徽州廣泛流行的保安善會祭祀活動，窺探了鄉村民眾血緣和地緣組織的契合方式。保安善會是夏秋之交舉行的一種迎神賽會，作者利用歙縣大梅口的《閩村保安會開會記錄》和《保安善會五隅科錢簿》，考察了該地1941年保安善會的組織情況。從中可以看到，賽會的組織以「隅」為單位，隅基本上是一個地緣團體，每個隅包括若干姓氏家族。共同舉行保安善會的地域內，共分為五隅，

以東西南北中命名。揆諸更多文書，徽州各縣城鄉多有「五隅」和「四隅」的提法，大致按方位命名，成員以族姓為參與單位，隅之歸屬實行屬人主義而非屬地主義，即家族的搬遷並不連帶所屬隅的變更。同時，又需看到，家族與隅的從屬關係帶有明顯的事務功能性，在不同公共活動中，某家族可依行事的便利從屬於不同的隅。因此，單個「隅」在功能和結構上幾乎等同於「會」，這個「會」的特殊性在於，它又是參與更大地域範圍內公共事務的一個組織和議事單位，在此情境中，「會」就成為了「隅」。

在書中，作者還利用村落文書探討了徽州的大、小姓紛爭和小農家庭生活狀況。以往關於皖南世僕問題的研究，多着眼於主家與世僕間的衝突，作者利用抄本《欽定三府世僕案卷》等文書，從大、小姓群體間矛盾的角度對該問題重新探討。從中可見，徽州民間對大、小姓的區分，並不以一村之內家族實力的強弱為依據，而以徽州一府六縣範圍內的宗族實力為指針。因此，眾多徽州族姓頻繁地聯宗、會譜，乃是基於現實生存的迫切需要，努力在徽州的名族座標中獲得一席之地，從而取得強宗巨族的奧援，免受他姓欺侮。另外，作者還通過分析《天字號鬮書》等文書，展示了小農家庭分家過程中大件家俱、生產工具細分共用等細節，徽州小農以契約和理性為支撐點的日常氛圍躍然紙上。

細節之中常藏有文化的密碼，書中論證不時閃現作者的細膩與睿智。在探討各基層組織間地位落差時，作者巧妙地從一份手稟的稱呼中，可靠地推斷出文會的地位遠高於約保（頁27，注6）。一首俏皮對比漢口人和徽州人祭禮儀節的《漢口竹枝詞》，就已經令讀者對徽州祭禮的莊重心領神會（頁139）。要探討基層社會的文化結構，首先必得解讀地方性的民間用語，書中對文書內容和地方俗語的大量解說，也顯示了作者對地方文獻的稔熟程度以及「在田野中解讀歷史」的扎實工作。

全書以新史料的介紹和解讀為線索，力圖通過村落文書展示徽州傳統社會民眾的日常生活（前言頁3）。但這一主旨更傾向於交代了一個研究領域，而沒有具體提出一個待以探討的問題，因此，各章因缺少一個貫通全書的問題，未能立體地有機組織起來，在邏輯上呈現出略顯鬆散的平面化格局。同時，每一章的論述亦通過核心史料的介紹而展開，在以史帶論過程中，因新史料本身內容豐富，不同片段提示出不同的學術問題，以史料介紹為工作主線，各章主體部份時常閃現的學術火花就不得不屈從於全面性介紹的推進，未得收攏而顯得鬆散。各章結論部份雖凝聚為若干主題，但也因前面論證部份問題分散，結論與論證間稍顯脫節，例如第一、第二章結論部

份，均追加史料，在前文史料介紹基礎上臨時提出新的學術問題加以專門論述。全書披露了大量稀見的村落文書史料，其中，傳統農村基層組織體系如何組成，尤其是血緣、地緣、行政和其他功能性組織通過怎樣的方式交錯疊合，成為本書所見史料較為集中反映的一個問題。如能聚焦於一條問題主線，進行標靶明確的學術史梳理，在此基礎上，圍繞問題主線，綜合新見史料，在與先行研究的對話中，逐級展開論述，相信更能體現學術史意義中史料之新意，從地方看中國的尺度擴展張力亦將更為強大。

鄒怡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安介生、邱仲麟主編，《邊界、邊地與邊民——明清時期北方邊塞地區部族分佈與地理生態基礎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9年，400頁。

關於邊疆的歷史地理，自清末以來不斷有研究者在此領域進行探索，或是隨着經世思潮之興起而興起，或是由於中俄問題之嚴峻而受到重視。研究方法方面也經歷了傳統的文獻考證、修訂，參照外國文獻、地下文獻進行考證，融入西方史學理論進行研究等階段。至1949年以前，邊疆史地研究歷經了兩次高潮。建國後至文革前，學術研究受政治因素影響較大，邊疆史地研究亦然，就北部邊疆而言，蘇聯之影響尤為深遠。近三十年來，對北部邊疆的研究在質、量方面均有所發展，一方面是論著的增多，另一方面是刊物《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創辦以及《邊疆史地叢書》等叢書的編纂。另外，由於邊疆問題與國家財政息息相關，也有不少學者在研究明代財政問題方面會涉及到邊疆的問題。上述種種，於材料整理收集、整體框架建構、重大事件考察方面已經有了相當的成就。然而，對於邊疆問題的研究，主要仍集中在對邊疆政治及經濟的關注上，而此種關注又往往由於文獻的多寡及作者的學術背景等因素，容易不自覺地以傳統王朝或漢族為出發點進行研究。另外，有關邊疆社會運作的研究似乎仍被忽略。

20世紀70年代，環境史開始興起及發展。環境史對之前將「人」作為對「地」產生作用並相互影響的觀念進行修正，注重將人作為環境中的一份子，研究人及人以外的其他因素，並將之作為共同作用的結構。將環境史引入邊疆史地研究範疇，使研究者更為關注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以及環境中